



谭步云

从编书“自用”到为广府文化尽“绵力”

羊城晚报：什么原因促成您编纂这样一本书？

谭步云：真正让我下定决心，非得做这么一本书不可，是1995年我和麦耘先生一起编《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的时候。那时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很多粤语词明明能说出来，却根本找不到对应的字来写，只能用方框去代替。有读者来信问某个字到底怎么写，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我们也有回答不上来的时候。从那时起，我就决心要编一本考证粤语辞源的书，希望以后读者再提问，我都能答得上来。所以，编这本书最初完全是给自己用的，没考虑过出版。201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问起，我就把书稿交给了她。

羊城晚报：完成这本书前后用了多长时间？

谭步云：我实际编了十来年，但如果从我第一篇写粤语的文章算起，已经有四十年了。在我读研的时候，李新魁先生对我说：“你是学古文字学的，又是广州人。粤语是古汉语演变来的，你本身就是一个粤语语料库，不去研究它的来源，有点可惜。”于是，我开始给《广州研究》的“粤语钩沉”专栏写文章，1985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广东地名里常用的“落”字。

羊城晚报：辞源编纂是一项“大工程”，为什么要一个人来承担，而不是依靠集体的力量？

谭步云：我受到我的“祖师爷”容庚先生的影响，他历来不主张集体创作。编纂辞典，每一个词的释义必须精确，每一个词条下的义项必须全面。如果是集体创作，成员之间的学术水平难免

历四十载，独力探寻粤语辞源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熊安娜 实习生 卢惠玲 郭嘉会

参差，每个人掌握的语料库也不同。这样一来，每一条内容最后都可能需要重新考证、补充义项，反而要耗费更多时间与精力。所以编纂辞典这件事，我还是倾向于由个人独立完成。

羊城晚报：这本书经历了怎样的编纂过程？

谭步云：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构思这本书，当时没有电子检索工具，只能逐页翻阅原始文献，其中的辛苦，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这本书收录了3900多条粤语古词语，标注形、音、义，及词条语义的源出文献。部分词条我还增写了“案语”，表达自己在研究的基础上对该词的辨析。

我所引用的文献大量来自地方志，以及广东人或曾在粤为官者撰写的笔记，其中涉及许多方言材料。在编纂过程中，我发现现存最早编录粤语方言词的材料是明代戴璟所编的《广东通志初稿》，其中设有专门的“土语”部分。这本书也是现存首部广东通志，我已将其列入引用书目。编纂这本书，需要阅读大量文献，我基本把广东的地方志全部穷尽了。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粤语辞源》文化价值何在？

谭步云：我想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纵向贯通古今，横向实现方言与方言、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比较研究。如果能成为广府文化起到一点作用——正如张之洞所说“要写有用之书”——那么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有广博知识体系作支撑方能“捞过界”

羊城晚报：您在序言里说，等退休以后才做这件事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被视为“异端”。为什么？

谭步云：我本身是从事古文字学研

究的，考证粤语辞源就跨入了方言学领域。可能有些方言学的学者会认为，古文字学者应该专注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古代文字的研究，我不应该“捞过界”搞这个东西。但文字是由古及今演变而来的，方言与方言、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如果做不到触类旁通，没有广博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那么粤语辞源的考证工作根本无从谈起。退休以后再做这件事，就无所谓跨不跨界了。

羊城晚报：您似乎比较特立独行？

谭步云：我承认我比较特立独行。我在中大中文系教授《古代汉语》多年，第一堂课总会和学生说：通论没什么好讲，如果毕业以后你们能够写一篇比较像样的文言文，写一两首像样的诗歌，或者哪怕过年时能为父老乡亲写上几副工整的对联——那这门课就算没有白学。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学术道路的？

谭步云：其实我读研究生是“被迫”的。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1979级的本科生，毕业后到广东民族学院（现在的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书。后来有一天，院长召集我们所有青年教师开会，说：“你们要么去进修，要么考研究生，不能以本科学历来教本科生。”正好那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文字学方向的研究生，我就去报考了。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工作。在研究所的八年时间，对我的学术研究有极大的促进。我参与了《聊斋志异评赏大全》《清车王府藏曲本子弟书全集》等书的编纂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一边整理文献、做研究，一边重新学习文学方面的知识，不停地看书、查资料。后来，我加入了陈永正教授主持的岭南文献研究所，参与《岭南文学史》的编撰。我在查阅大量地方文献时，发现其中有很多不认识的方言字，这就和我的文字学研究联

系起来了，于是我开始专门研究这些方言字，也为《粤语辞源》的编纂打下了基础。

羊城晚报：在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学术路径？

谭步云：没有，我这个人“胸无大志”，而且当时没有考核指标。大概是1997年的时候，我要去报副教授职称，因为那时候职称开始和小孩入学、房子分配联系上了，所以只好拼命地去发文章，这才评了副教授。所以我的很多事情都是人家在后面用鞭子抽打着、赶着才去做的。但我还是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比如写作、读英文原著。

对粤语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羊城晚报：为何您认为粤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

谭步云：根据我目前的研究，至少有四个粤语中的字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并且保留了当时的发音：第一个字是“揸”，它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就被注为“从乚虚声”；第二个字是“界”，这个字从甲骨文时代到现在，字形几乎没有变化；第三、第四个字是“廿”和“卅”，分别表示二十和三十。关于粤语的来源，有人认为它源自百越少数民族语言，但我认为，粤语一直是古汉语的一支，从楚语中分化出来，才进一步融入到南楚语言体系中的。

羊城晚报：现在大家都在谈“守护粤语”“发展粤语文化”，您觉得生活中讲粤语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谭步云：现在讲粤语的群体是在扩大，不是缩小，我对粤语的未来从来都持乐观态度。粤语是一种“强势”的方言，连《新华字典》都收录了不少粤语词汇，像“海鲜”“埋单”等。最近我在写



《粤语史》，其中有一章专门讲到粤语教学的历史。粤语教学从清代就已经开始了，在今天，广东地区的各类粤语教材就有五六十种之多。2013年我去西藏民族大学访学时，曾看到四五百名学生一起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粤语歌。我深信，粤语是不会消亡的。

当然，正如客家话俗语所说：“宁卖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我很赞同在《粤语辞源》新书发布会上詹伯慧教授说的：“小孩子在家不说粤语，是家长的责任。”同样，也正如黄俊英老师那天所说，我们应当培养孩子们说方言的自豪感。

羊城晚报：对于现在高校的中文教学有何观察和建议？

谭步云：2002年高校推进教学改革时，我提出过几点建议：首先，中文系应当考虑取消《外国文学》这门课程，不懂外语的教授们教不了外国文学；其次，应当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两门课程合二为一，把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内容都融入进去。学科专业化、过度细分的恶果，就是学文学的不懂语言学，搞语言学的不懂文学，这不好。



【喧嚣之余】

宋明辉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座教授

锡耶纳日记

我们继续走到城市东南角一个高处，是一座供奉圣玛利亚的教堂，也非常高大，但没有主教堂的华丽，在这里可以俯瞰罗马松掩映之下的锡耶纳城市全景。这座教堂一个人都没有。我们走来走去的这许多古老巷道，也都没有人影。

这座教堂下面还有一个罗马门，非常古朴。出了这个门似乎就是现代的城市。再走回古城里，从城市中斜斜着走过去，没想到这样一路起伏，居然是一座山城的景色。在一个停大巴车的地方，看到了市政厅的后面，市政厅背景依然感觉壮丽。

市政厅在城市的低凹处，继续爬坡，走到从对面所见的高大建筑群，原来是一个不知从什么时候就有的修道院，太古老了，草木都长在建筑里面。我们在此歇脚，可以看到刚才从对面走过来的那个门口处是罗马松的圣玛利亚修道院，也可以看到更远处的托斯卡纳平原，阳光之下，远近都很明媚；眯起眼睛细看，不远的地方就有另外一个古城。看起来托斯卡纳真是处处都是好景致。

绕过修道院走了一圈，看到春树绿意盎然，有一对少男少女在树下亲吻拥抱，几个世纪以来场景一样。最后一个路过的景点是锡耶纳的圣女卡特琳娜的教堂，傍晚七点钟了，在非常清秀的一个庭院里听颂歌不绝。



【拒绝流行】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

驯化了AI的书房

前段时间深圳一个语文老师出的作文题火了：用一个字证明你不是AI——有人选“妈”，因为AI没有妈；有人选“慢”或“纯”，彰显人的反效率；还有“恨”“悔”“痛”，等等。

这个题目很有深度，看似在“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反观中彰显人的独特性，却包含着一种“AI成为人之尺度”的反作用力。人与AI已深度纠缠，只有在与“AI性”的对话中才能看见深刻的人性。就像我一个写文章的朋友，文字越来越充满机味，她会把自己“不说人话”的文字喂给AI，用“请说人话”让AI帮自己修改。

有平台近日又组织了一场文化名人关于“孩子到底能不能用AI”的研讨，张越、王昱珩、沈奕斐、戴建业等人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观点仍然是各说各话且截然对立，有的担心AI丝滑完美的答案剥夺了孩子的思考过程，最后变笨、走向“思考不能自理”，或失去创造导致平庸。有的则认为应该积极拥抱AI，在驯化AI中去创造，避免让孩子浪费时间在AI能替代的重复性任务上，成人要向孩子学习AI。

对立吗？其实并不对立。比截然相反的观点本身更重要的是“到底能不能用AI”这个议题。“用一个字证明你不是AI”这个题目中的看似否定的“不是”，恰恰反向说明AI对人的全面渗透，无处不在。同样，孩子能不能用AI？这个议题本身已经说明，AI已经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生活和学习装置，深度嵌入日常生活。

AI涌向未来，一间父母陪伴着一起驯化了AI的书房，也许是最好的学区房。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无人报警

二十年前到意大利去，皮包在佛罗伦萨被技高胆大的扒手划开一道口子，失去了几百美金。

有了前车之鉴，今年重游意大利，我提高警惕，步步为营。

这天下午，在罗马闹市区的一家便利店，日胜掏出50欧元，买了两张车票。正等着找钱时，店铺一隅突然传来了穷凶极恶的打斗声，乒乒乓乓，我惊悚地转头去看，赫然发现四名男子正围殴一个高个子，我俩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想要尽快离开，可柜台职员却坚持要我们等，50欧元还握在他手里，我们别无选择。令人诧异的是，围观者众，却无人报警。

看着这一切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事竟然是由我们“引起”的。

殴打结束，围观者散去，秩序迅速恢复正常。这时，参与打斗的一名店员走近柜台，问日胜：“你的手机呢？”日胜一摸裤袋，哎呀！手机竟然不见了。店员摊开手掌，说：“在这儿呢！”原来日胜进店不久，手机便被高个子扒走了。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店员瞅见，一拥而上，围殴他，把手机夺回。

人性的善与恶，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展露无遗！



● 随手拍 图文伍振

西岭雪山



【夕花朝拾】

杨卓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重新发现北京

裴丽珠的《北京纪胜》被林语堂许之为“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关于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中外著作多有引用。她凭借旅居中国数十年的经验，有着独特的跨文化视角与女性的细腻笔触，突破西方游记的异域化套路，将历史考据与个人见闻紧密交织。她每写一处，必关联该处的历史传说与亲身见闻。她笔下不仅有北京城墙、紫禁城、天坛等著名地标的庄重，也有胡同里百姓生活的烟火气，还有民间习俗与节庆的热闹。800余条学术性译注，为读者扫除阅读障碍，可以更好地触摸历史温度，感受京城魅力。

我的朋友邱小石在公众号书评里说：“裴丽珠看见的北京没那么多‘杂物’，比我们看到的更‘干净’。当我想起一些北京的什么，就看几篇《北京纪胜》。过去了百年，觉得书中所写的一点不过时：北京更清晰了，许多场景历历在目，甚至唤醒了看见过但不在意、在大脑某个位置沉睡的细节。不经意间，我又神游了一番。”我们惊喜地发现：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北京，在一个外国人眼中，是熟悉而陌生的，这种熟悉的陌生感，是我们阅读这本书最大的意义。

成都偶逢降雪，向西眺望，那抹横亘天际的银白，恰似大自然遗落的玉簪，这便是因杜甫诗句而得名满天下的西岭雪山，坐落于成都市大邑县境内，自成一方天地。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wyb@163.com



【梅川随感】

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赵萝蕤教钢琴

上一篇写赵萝蕤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时“种菜养鸡”，这一篇该写她在西南联大时教授钢琴了。这样，她的西南联大生活才相对完整。

1940年12月2日，赵萝蕤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发表散文《象牙的故事》，开头就说“逃难到了最后方，出了象牙之塔约两年”，她是把她爱好的听音乐弹钢琴视为“象牙之塔”的。她本以为到了昆明，“在象牙之塔和普罗列塔二塔之间受了两处的挫折”，“磨得心力交瘁”，不料却遇到了“一件关于象牙的实事来”。

原来赵萝蕤被邀请去担任家教，教授一位“胜如画中的安南美人”弹钢琴。她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如何去到“整肃而明丽的‘美人’的家，如何见到‘一架光亮的钢琴’。而‘美人’的‘至诚与勤学’也深深打动了她。她觉得自己‘结了这样一个象牙缘’，决定‘以百倍的虔诚来报答她’。

文中流露出赵萝蕤深厚的古典音乐修养。她为学生教授“舒伯特或晚邦”的小曲、“李斯特更是何等美妙而和谐”，“贝多芬的Elise清新而优雅”……特别是赵萝蕤写到她边教授边“揭开贝多芬Appassionata的最后一章，暴风雨似的来了一个痛快”，“又揭开了几首晚邦，安安静静地弹了一支夜曲”，“还尽可能地找出几个心爱的老朋友来”，其中包括了 Scriabin、Satie、Nieman 和 Debussy 等，从古典到浪漫到印象派的古典音乐大师，她几乎都写到了。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冰与火的叙事美学

人与AI相比，优势在哪里？在飞速运算的概率面前，情感、身体、真实、美、时间、自由、尊严、记忆又意味着什么？

费多的小说《雪崩》描述了天才程序员欧迎风，曾开发围棋AI“巨灵”，后被昔日伴侣乔希阳排挤出公司，独立开发“火鸟”，在AI围棋“电圣战”决赛中，与往届冠军“巨灵”对弈。比赛开始时，AI程序轻松驾驭围棋的万亿种变化，坐在赛场上的“棋手”，实际为执行AI指令的“机械手”。比赛中途，当黑客攻击导致“火鸟”系统异常时，欧迎风毅然选择以人类棋手身份亲自对阵AI“巨灵”，展开了一场充满象征意义的“屠龙”搏杀——向死而生，欧迎风的落子不再追求胜率，而是对母亲所授“围棋之道”的回归。当围棋算法成为囚笼，欧迎风以肉身对抗算法，人类最基础的“用手落子”动作反而成为尊严的象征。

小说中，人的情感与记忆写得很多人。欧迎风想起身为数学与围棋天才的母亲流落在长江边某个码头生活，又因“疯病”消失；乔希阳试图用资本逻辑框定欧迎风的创造力，而赛后，她孤独地站在深山“透桥”之上，掷出珍藏在衣袋里的那枚母亲赠给他的廉价塑料棋子……终于，创伤记忆得以解脱。

雪崩的时候，坍塌的面积远比想象的广阔。当技术替换了记忆、情感与身体，人性的“最后一块木板”，其实就是承认脆弱的勇气——那正是无法被算法简化的生命痕迹。